

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与基督教教会的因应^{*}

——以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为例

邓 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作为因应，吴耀宗与基督教其他领袖人物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由于新中国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及中美关系的恶化，基督教在川康边地的工作难以为继，基督教将在华事工逐步停办或移交政府接办。

关键词：新中国 基督教 边疆服务 川康地区 因应

作者：邓杰，1973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

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相适应，新中国的宗教政策陆续制定出来，最早见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在基督教方面，通过与中共上层多次沟通和协商，吴耀宗与基督教其他领袖人物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得到中共的赞赏和支持。但由于新中国与美国意识形态的不同，特别是因朝鲜战争中美外交关系的不断恶化，边疆服务运动的工作已无法正常运转。由于政府有关宗教的政策规定以及与国外的联系中断，基督教将在华事工逐步停办或移交政府接办。本文将以此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创办的边疆服务运动为例剖析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及基督教的回应。^①

一、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及中美关系的变化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让宗教界人士稍觉意外的同时也深感振奋。基督教代表吴耀宗的会议发言就吐露了这种情感：“在新中国建设的计划中，宗教占有了它所应当占有的地位。在《共同纲领》里面，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是明确了

*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教育部2011年规划项目《基督教与川康地区文化的冲突与调适研究：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川康的活动为例》（序号4212）及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项目《抗战时期基督宗教对川康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认知——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个案进行考察》的阶段性成果。

① 涉及该问题研究的主要有杨天宏：《政制转型与中国教会的调适——基于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后期经历的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3）；汪洪亮：《变动时局中的中国基督教会》，《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11）；曹圣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缘起》，《中国宗教》2004（01）；叶小文：《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宗教》2001（02）等，可资参考。

的。我们宝贵这个自由，我们也决不辜负这个自由。”^①

新中国建立后，教会人士围绕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在新中国的处境与出路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不同的意见。^② 针对基督徒的争论，吴耀宗写了《基督教的改造》一文，认为“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确是利用了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愚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吴氏认为，在西方国家宣教师和宣教会的主观意念中，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完全出于纯洁的动机。然而，“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究竟逃不出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③ 吴耀宗特别就基督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方向和努力的途径作了阐述：

首先，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再其次，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最后，基督教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④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吴耀宗等人谈到的中国基督教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表示赞赏，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当互相尊重。^⑤ 周恩来的讲话使中国基督徒受到极大的震动。边疆服务运动的负责人崔德润在给同工们的一封公开信里的一些话就很能代表基督教人士对于时局看法的转变：“有些人以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宗教，因而对于教会工作的能否存在，发生疑问。这是一种错误，是一种多余的顾虑。中国共产党虽否定宗教，但并不取缔宗教，宗教信仰自由，人民政府有负责的保证。各宗教团体所办的社会事业，只要有益于人民大众，不但不禁止，反予以种种便利助其发展。”^⑥

为了统一认识，吴耀宗与基督教的其他领袖人物广泛听取了基督教各团体、各教会领袖的意见。综合基督徒在各种座谈会上的意见之后，40位基督教领袖于1950年7月28日向全国基督教教会和团体负责人及教徒发出了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的宣言。^⑦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祥作为文件发起人之一在宣言上签了字。

宣言的发表迅速促成了基督徒的自发签字运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和40位发起人致全国同道的信，用巨大篇幅刊登了首批在宣言上签字的1527位基督教徒的名单，并特地发表了一篇名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这篇宣言，申明了基督教徒在新中国所应有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政治立场，并指出了中国宗教界的正确的努力方向。”对基督教人士所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社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基督教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第二天，《上海大公报》也以《基督教的进步》为题发

① 《天风》第8卷第9期，1950年3月11日，第12页。

② 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社会服务栏”以《基督教徒的觉醒》为标题刊出了5位基督徒的来信，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这封来信在基督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报纸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久，该报又选登几封来信，其中2篇持反对意见，3篇赞成。《大公报》“社会服务栏”记者为慎重起见，在吴耀宗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回来后，请他就此问题作一总结，“指示基督教徒在现阶段应有的思想改造及今后努力的途径”。

③ 摘自1949年7月16日至18日《大公报》的相关内容。

④ 吴耀宗：《基督教的改造》，上海《大公报》7月18日。

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80-182页。

⑥ 《致本部同工的一封公开信》，《边疆服务》复刊第1期，1950年3月，第34页。

⑦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表评论:这是“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极好的现象”,认为宣言是“一个响亮的号召”。^①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对中国教会人士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美关系迅速恶化。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其辖区内中朝两国的财产。受这一冻结影响,中国很多基督教团体和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及教会主办的救济事业都几乎无法再展开有效工作。美国的这一行为被教会认为是逼迫中国教会屈服,这引起了基督教界更激烈的反响,大大激发了中国教徒的爱国热情,许多基督教团体立即宣布,从1951年起,不再接受美国的津贴,也不接受国外任何方式的津贴。

作为对美国政府这一敌对行为的因应,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的公私存款。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在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上作《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该次会议还通过了《接受美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相关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依法向政府登记,并报告其工作及经济(资金、津贴来源及使用)情况。对于政府的这一决定,中国基督教人士纷纷表示拥护。

因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社团和救济机关情况复杂,为使该工作顺利进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1年3月6日决定,省市以上设立各级“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社团和救济机关处理委员会”;各级处理委员会之具体工作,由救济分会或民政部门负责。据此,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6月23日召开了第41次行政会议,并通过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于6月26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内开始办公,并就西南区的“接受美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进行了登记。^②

二、中华基督教会对新形势的因应

面对上述形势,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的服务等工作开展已不能延续以往的模式。其服务等工作如何应对新形势?对此,边疆服务运动负责人崔德润在给川西区主任王贯三的信中作出了指示:

本部为基督教会所主办的一个为服务少数弟兄民族的服务团体。我们一向的主张是:服务工作,一定要名副其实。我们要注意不要让人误会藉服务之名,进行传道之实。我们有正式教会的地方,应该有人正式负责宗教活动。我们没有正式宗教的地方,只应认真地推行服务工作。我们的宣教同工必须热心参加所有的服务工作。我们的其他同工,却不必向外兼作传道的活动。^③

从该信中可以看出,崔德润对于边疆服务部宗教工作的开展已经十分谨慎,在“有正式教会的地方”,才允许开展宗教工作;除了宣教师之外,其他人不必传道。并且明确表示“服务就

① 转引自《协进月刊》,第9卷第2期,1950年10月16日。《三自宣言》发表后,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于1950年10月18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协进会十四届年会。经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吴耀宗等人的大量工作,争取了协进会的上层基督教领袖对中共政策的支持。协进会十四届年会代表表示拥护《三自宣言》,并将“三自”计划确定在5年内实现。

②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央、西南卫生部、川西行署有关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医院的指示、办法、通知及西南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医院会议的总结报告》,全宗号建西32,案卷号91。

③ “崔德润、刘龄九致王贯三(1950年12月15日)”,汶川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50-1951年崔德润等同志写给王贯三主任的信》,全宗号84,目录号1,案卷号69。

是服务，不是传教的附带工作”。由于有这样的顾虑，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各项服务工作自然已无法继续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边疆服务总部还要求各服务区“要以四事来号召全体同工共同努力各尽所能”：第一“节约救灾”；第二“尽力买公债”；第三“加紧开荒生产”；第四“密切同政府合作”。^①不仅如此，《边疆服务》在登载川西区主任王贯三“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时，冠以了“提出检讨、请求批评”的副标题，可见对时局的一种“紧跟”。

根据总部的相关指示，各服务区一方面开始适时收缩宗教工作。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服务区建议总部“不再轻易聘请宗教干事”。不仅如此，王贯三在“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中，并没有罗列详细的宗教计划，只有“详细的计划将由全体同工开会详细检讨决定”一句话代替，这足以看出服务区对开展宗教工作的极大担忧。^②与之相应却是各服务区要求同工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各工作单位每周必须举行一次工作检讨会。会议内容主要为“坦白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工作及个人作风上的弱点”；除此之外，还应“规定学习时间，加强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在“宗教学习”之余，还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及毛泽东思想等学习手册”的“新知识学习”。为确保服务区干部会议“检讨和制定工作的正确性，特邀请人民政府派员参加指导”。^③

在此情形下，川西区主任王贯三要求同工“个人之宗教生活先要革掉”，“礼拜堂以外的宣教活动，应该暂行停止，甚至儿童主日学都须要考虑暂停”，要求“所有教育工作单位如学校、幼稚园、儿福站、护训班等内，决不要有宗教意味的活动”。^④由此在有政府“同志”参加的检讨会上，边锡龄自曝“宗教生活冷淡”，布道员王素清检讨自己“对神虔诚方面不够”，崔卫国自觉“宗教灵修冷漠”，李仁杰承认“宗教学习疏忽”。^⑤

西康区的情形也大致相当。建国初期，西康区因“经费大感困难”，虽罗家场等地仍然还在开展日常传道工作，但以往举行的“妇女谈道及家庭拜访”等项工作已趋于停顿。^⑥在1951年下半年会议的决议案中，西康区部“希望请求政府将现在移交中的各项工作尽速将手续办完，俾保留的工作可按预定计划作下去，特别是有关于教会自养的生产服务组必须搞好。其余服务工作，凡本身无力经营者，作有步骤的，逐渐请政府接办。”^⑦从这一决议案可以看出，西康区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已经基于“自养”来维系，并希望能与政府有相关合作。

之后，西康区规定，除西昌堂会“应完全自养”外，河西、德昌及杂谷脑三堂的开支，仅以供给传道人员的薪水。与此同时，边疆服务运动负责人开始做同工的思想工作，尽力使之相信政府是可以信赖的：“我们有着这样的好政府，只要我们是纯正的全心全意的为少数弟兄民族服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照顾的，我们更用不着害怕。”希望同工在“在各种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岗位，努力服务的精神，取得政府的重视和边胞的信赖。”^⑧

① 《各尽所能》，《边疆服务》复刊第2期，1950年5月，第2-3页。

② 《川西区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边疆服务》复刊第2期，1950年5月，第18-20页。

③⑤ 汶川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1950-1951年度第一、二届干部会议记录》，全宗号84，目录号1，案卷号65。

④ 汶川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1950-1951年崔德润等同志写给王贯三主任的信》，全宗号84，目录号1，案卷号69。

⑥ 《西康区三一新村服务处工作简报》，《边疆服务》复刊第2期，1950年5月，第22页。

⑦ 《边疆服务部西康服务区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合作检讨会纪录》，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西昌基督教青年团契的情况及下半年工作记录》，全宗号14，目录号5，案卷号300。

⑧ “中华基督教会西昌区革新委员会组织草案”，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伪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西康区移交清册及有关文书（1949.5—1954.11.17）》，全宗号14，目录号5，案卷号32。

与此同时,西康区教牧人员积极参与政治学习,“每周有三次”,力图使教会置于“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基督教徒在政治学习上表现的热情,反映了宗教人员对于新政府政策的拥护。^①

三、政府接管与边疆服务运动事业的终结

前已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1年7月24日公布了“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该“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已经实行自养之基督教教会和团体原来所办之社会服务事业,如医疗机关、福利机关等,其经费能自给者,可继续办理,但须组织董事会,保证实行政府法令。董事会名单应由政府批准。”根据这一规定,是年9月初,边疆服务运动负责人商请总会将原来的辅导委员会改为董事会,全权负责运动的各项工作。^②

为取得政府信任,董事会成立后,崔德润每半年给政府呈送一份书面报告,汇报部门活动动向及人事调整。^③

边疆服务运动虽有上述组织机构的变化,但这已经不能在根本上改变其在新时期的命运。如前所述,各服务区已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边疆服务运动初期,政府及外国的捐助占据了运动经费的大半。解放后,因国家政策及国家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恶化,上述两项主要经费来源消失。从1950年起,工作所需经费总会只提供1/3的补助,其余2/3经费需各服务区自筹。1951年,总会1/3的补助不再提供,也不再为其募捐,要求各服务区所有工作能请求政府接办者即应接洽,教会应尽可能走向自立自养,政府不予接办而又无力支持者则停办。^④

依据这一指示,各服务区随即与当地人民政府接洽,请求政府接办。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川西区和西康区分别与茂县专署及西昌专署接洽。

建国初期,川西区因经费的限制,“只先急其所急的办理数种工作”。^⑤区部原计划在1952年1月与茂县专署接洽,请求政府接办,后因“三反”运动中断。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杂谷脑医院及理县诊所被查封,业务暂告停止。9月理县政府通知杂谷脑医院和理县诊所继续营业,后由川西区代理主任孙自宽与理县及卫生院协商,将两处合并,改在理县通化镇设立通化诊

① 《西康宗教界团结的好》,《田家半月刊》第17卷第4期,1951年12月15日,第7页。

② 董事会最初由刘伯常、杨汉声、邹秉彝、王俊贤、胡敬伯、李安宅、杨嘉良、李连克、王问思等9人组成。董事会的主席为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干事刘伯常,书记为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文学部主任杨汉声。后邹秉彝、杨嘉良因工作关系不能参加会议,故以辅导委员李果良、黄振良替补。董事会之下,有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事务兼会计一人,工友一人,共计四人。由主任主持其事。1952年,李安宅离开成都,杨嘉良因工作关系不能参加会议,改以他人替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书面报告补充报告》,全宗号:民41,案卷号3010。

③ 笔者所见相关的书面报告包括:(1)《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一年度半年书面报告(时间不详)》;(2)《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一年度第二次书面报告(时间不详)》;(3)《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二年度第一次书面报告(时间不详)》;(4)《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报告(时间不详)》;(5)《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补充报告(1953、2)》;(6)《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报告(1953、4、14)》;(7)《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度书面报告(1953、12、31)》;(8)《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办理结束报告书(1955年10月31日)》(以上报告均见于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

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二年度第一次书面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1951至1953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

⑤ 汶川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民国三十八年教育、卫生工作报》,全宗号84,目录号1,案卷号63。

所。诊所于10月开诊,积极推动全区爱国卫生运动。杂谷脑福音堂因教友少,且房屋器具为幼稚园所用,该堂的工作遂于1953年1月结束。

至此,川西区工作已无再继续的能力。1953年4月25日,代理主任孙自宽将川西区所有单位、人事造具清册,分别送达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请求政府接收。^①在此之后,川西区工作停顿,宣告结束。

西康区的情况亦如是观。早在1948年夏,任职多年的西康区主任王伯勋坚辞行政职务,此后,西康维持行政的中心组织乃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也没能改变西康区的历史命运。

1954年1月5日,西康服务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本部西康服务区部结束的决议”,指出:“西康服务区服务工作均已先后移交政府接办,碘盐试验亦因西昌近已划为川盐区即无再行行之必要。西康区部应即办理结束。”^②

随后,西康区部拟订《边疆服务部西康服务区结束决议实施办法》,决定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西昌区革新委员会”,接管西康区教会工作。至此,该运动工作已大部分交政府接办。^③

在两个服务区结束工作之后,设在成都的边疆服务部总部便已失去存在的必要,乃主动呈请政府接收工作。1955年10月29日,边疆服务运动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的主题即为宣读边疆服务部申请的结束书,并决定该部及其董事会于该年10月底正式结束。^④

四、小 结

建国初期,中华基督教会对于新中国的宗教政策虽然予以积极主动回应,但边疆服务曾经与国民政府某些高级官员发生瓜葛,并获至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及教会组织的经济援助,在解放初期国家政治转型、人们曾经有过的政治立场被高度看重的背景下,中华基督教会被列为统战的对象,教会人士开始了自身的改造,边疆服务部同工的处境尴尬已在情理之中。加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是一个超越教派的“合一”组织,其内部本身就具有不同教会主张的派别,只是因“中华”或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原因将不同教派联系到了一起。这对基督教的本色化是一个有力的推进,但由于内部的主张多元化、教派结构的纷繁,又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教会事业的发展。加之建国后,人民政府虽然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但边疆地区的社会改造很快被纳入到国家建设的整体计划之中,成为人民政府重要工作,无需再由教会单枪匹马的搞什么边疆服务,边疆服务随之很快结束其历史使命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袁朝晖)

① 《川西服务区部五二年年终总结报告》,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川西区服务部登记表、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7。

② “关于本部西康服务区部结束的决议”,凉山州档案馆馆藏档案:《伪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西康区移交清册及有关文书(1949.5—1954.11.17)》,全宗号14,目录号5,案卷号32。

③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一九五二年度第二次半年书面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

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办理结束报告书》,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1951至1953年工作报告及申请结束报告》,全宗号:建川50,案卷号436。